



新观察·年度综述

文学在末梢处触摸历史

—2011年中篇小说综述

□师力斌

如果从反映当下中国转型进程的角度来观察一年来的中篇小说创作,可以清晰地看出一个重要脉络:现实主义。将这些作品连缀起来,就是一部栩栩如生的中国转型的历史记录。人事、房事、车事、股事,一应俱全;新事物、新现象、新经验、新人物,异彩纷呈;比调查报告细腻,比电视剧深刻。对于身处人口众多、幅员辽阔的国家的读者来说,几卷小说在手,不动地方,便可知这个巨大的发展中国家正在发生的巨变。这些变化有时几乎不易察觉,通过这些小说来解读,会令人吃惊,甚至让你怀疑自己的孤陋寡闻。这些作品仿佛社会这棵大树的细枝末梢,虽在边缘,但对社会变化有敏锐的触觉。作家们没有局限于个人小天地,有大的关怀,有深的思考,能够将大历史和小体验有机融合在一起,呈现了大转型时代的社会症候和精神现象,体现了文学创作源源不断的活力。

作家们关注最多的就是城市化进程,突出了几个关键词:上楼、拆迁、上访、小人物。所谓上楼,是指城镇化过程中,农民出让耕地之后,搬入城市楼房,开始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的生活。也就是说,他们要告别过去的生活方式,转入新的城镇化生活。这是中国当代城镇化加速发展,农业结构大幅调整,农民生活和观念急剧变化的历史性转型,其深刻性即使在中国两千年的历史中都是前所未有的。反映拆迁、上楼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就是乔叶的《盖楼记》。乔叶是“70后”作家中出类拔萃的书写者,艺术日渐成熟,语言风格鲜明,长于女性描画,在官场(如《打火机》),亲情(如《最慢的是活着》)、基层(如《盖楼记》)等多种题材间自由游走,显示了巨大的创作潜力。《盖楼记》有着专题调查报告的功能,精准、真实,细致入微地呈现了农村在城市化进程中的历史细节和复杂微妙的农民心理。它在社会分析和心理诊断两方面都令人惊讶。《盖楼记》告诉我们,乡村城市化是怎样发生的,农民是怎样“被”上楼的,楼是怎样盖起来的,盖楼的过程有什么猫腻,地方政府和农民的动机如何,矛盾是如何发生和怎样解决的。小说体现了强烈的社会关怀和明确的历史意识。从中我们可以了解,原来的农村怎样变成了完全陌生的城市,一条街怎样诞生,在这条街上盖一栋楼花多少钱,用什么尺寸的砖,一块砖多少钱。小说深刻的地方在于,不仅写出了农民被上楼的大历史趋势,而且还写出了农民与基层政权在某些方面的合谋,这是历史变迁中微妙而奇怪的地方。一部大作品应该具备两个素质,一是境界开阔,或“凌绝顶”的气势,或“尚思为国”的情怀,或“天地之悠悠”的眼界。二是技术娴熟,能让巨大的情感在“众山小”“铁马冰河”“独怆然而涕下”上集中体现,让纸上演活如现实,让你感觉人物是真实鲜活的。大部分作家可能都有这种两结合

的梦想,但真正融会贯通,难上加难。二者的融会不是物理变化,而是化学反应,是生命的交融。

为什么会“被”上楼?郑局廷的《上楼》给了一个回答。地方政府与商业资本的双重推动是基本动力,也就是GDP推动和政绩冲动。作品的题目本身就抓住了历史的七寸。在郑局廷的小说系列里,《上楼》是一部标志性作品,它抓住了城市化进程中的征地、拆迁、上访、群体性事件等关键问题。思考上访问题是《上楼》的重要主题。群体性事件的发生,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即是群众对基层腐败恨之入骨,对一些基层干部失去了信任。与《上楼》相似的作品还有陈斌先的《行走的姿态》,也反映拆迁问题,以文学记录了大历史中的小足迹。

围绕住房,孙春平的《沾婚》上演了一出假离婚骗房的都市戏剧。夫妻二人为分房,办了假离婚,以为能够掌控,但事情的发展完全超出了预料,向着与愿望相反的方向发展。小说揭示了城市生活中新的社会现象。

陈应松《一个人的遭遇》是近年来少见的一部充满强烈批判现实主义色彩的优秀作品,沉痛而尖锐。它深刻反映了中国底层社会在改革发展进程中出现的利益偏差和矛盾。上访职工刁有福一个人的遭遇或许是许多人的遭遇,他维权的过程、遭遇的压力、身心崩溃的结果震撼人心。小说典型地揭示了基层政权在矛盾化解工作中存在的一些致命弊端。

邵丽的《刘万福案件》是另一种视角下的个人官司。杀人犯刘万福砍两人,被判死刑,然而村民一齐为他求情,原因何在?为什么刘万福要杀人?这成为小说思考的核心问题,作者抓住了农村问题的一个症结。农村问题千头万绪,有两个问题至关重要,一是经济问题,一是社会问题。经济问题涉及如何脱贫致富,改革开放以来的成功实践向世界展示了这个古老国家的巨大活力和中国共产党强有力的执政能力。而社会问题则包含农村恶势力的问题。邵丽试图从体制上来思考底层农民的生活处境和社会机制。小说告诉人们,不论谁处在刘万福的境地,都会拍案而起,手刃仇人。刘万福分明就是当代武松。

依旧是写农民,杨争光的《驴队来到奉先畴》立意甚高、雄心颇大。它要回答“土匪是怎样炼成的”,欲以一个寓言式的故事,揭示人的征服与被征服的内在规律。围绕农民何以变成强盗、少数人何以能征服众人、征服何以最终失败这样的问题,故事讲得细致入微,煞有介事。小说抽空了时代背景,有超强的影射力量,让我们想到起义领袖、山大王等历史形象,具有一种哲学层面的超越性。

姚鄂梅的《你们》捕捉到了急剧的城市化进程带来的阶层

分化。“你们”包含了明确的身份意识和反思色彩。掌握资源、占尽好处、无所不能的大柳和“我”等都市上层人群“我们”,与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却长于阴谋诡计的高锐所代表的“你们”,成为令人瞩目的两个都市群体。小说呈现了两个群体间的矛盾冲突和共生关系,包含着都市底层群体的强烈诉求。小说同时也表明,当前的主流文化对于城市外来人口的态度,已经从曾经的歧视、排斥,向着接纳和认同转变。像王宝强、西单女孩、旭日阳刚这些近年来突起的城市外来文化形象,就是最好的佐证。

季栋梁、杨少衡、丁邦文近年来长于“人事”书写。丁邦文的《人事》包融了官场的种种运作规则,有不小的读者群。季栋梁的《例假案例》是对市场化进程中的教育问题的敏锐捕捉。它将教育行业的歪风邪气与官员腐败联系起来,一点也不故弄玄虚。一位女教师普通的一次例假引发了一次不同寻常的教学事件,并引起一连串戏剧性冲突和矛盾,充分体现了文学关注现实的能量。杨少衡的《702疑案》思考基层干部的官场潜规则和腐败现象,由一起车祸引发的官场地震波及开来,疑窦丛生,环环相扣,于水波不兴处展示官场斗争的巨大波澜。这部作品在杨少衡小说系列中,出现了少有的留白,表现力反而增强,这种写法表明了作者艺术探索的努力。

胡学文《隐匿者》、小岸《车祸》以及红日《报废》,都从“汽车”这一符号入手,对当下社会和人的心理变迁进行了观察。在汽车工业疯狂的推动下,“汽车”成为霸权性的文化符号,越来越成为文学关注的对象和创作的灵感来源。小岸的《车祸》包含了优秀小说的精髓。它以一个美容店打工女孩的生活奇遇为线索,讲述了当代人的精神变迁,对深入社会骨髓的拜金主义进行了批判。无论在技巧还是在思想层面,小说都达到了令人刮目相看的境界。作者成功地将一次寻常的车祸发展为一次现代人的精神冒险。红日的《报废》以小见大,讲述一部旧车的报废过程,写出了官场的游戏规则和社会转型期的戏剧性。小说对事业单位在经费使用上的曲折困难和复杂性,有着精彩的刻画和深入的体认,客观、冷静、精细的笔法,有所谓“零度写作”的气质。

如果说《车祸》和《报废》思考的是社会外部环境的变迁,那么,《隐匿者》则是对人的内心的深度探究。《隐匿者》极具现代主义小说的风味,试图探讨在金钱的驱使下,人性扭曲可以达到何种程度,是市场经济时代金钱拜物教的高度写真。围绕20万元车祸赔偿金和一起车祸的后续故事,小说将肇事车主、赔偿金的冒领者(即隐匿者)、隐匿者的妻儿、真正的死者、勒索者的巨大人生变故和心理变化尽情

呈现,上演了一出当代中国的心灵戏剧,揭示了市场经济给人带来的心理冲击。小说将现实依据和良心的激荡有机地结合起来。

王听明是一位能驾驭多样题材、问题意识强烈、富于思想深度的作家。他的一系列作品,《北京户口》《风水宝地》《并非游戏》《红宝石》《方向》《村长秘书》等,涉及京漂生活、大学生村官、大学生二奶、官员封建迷信意识、集体企业改革等多种现实问题,能够从纷繁复杂的社会变动中抓取素材,捕捉新的历史现象和社会经验。《村长秘书》是一篇代表性作品,以积极的姿态和现实主义精神,写出了大学生村官这一新生力量在农村遇到的新问题和新经验,呈现了农村改革利益再分配中的复杂尖锐的斗争和农民复杂的心理。人物形象鲜活,语言生动,思想性和艺术性俱佳。王听明的创作对当下创作中普遍存在的题材陈旧、资源枯竭问题是一个启发。

袁亚鸣《泄密》的题材令人眼前一亮,它以期货交易为内容,描写了中国新经济领域惊心动魄的利益纷争,让人们想起上世纪30年代茅盾的《子夜》。由于领域独特,这个题材鲜有人接触。这部小说写出了期货领域勾心斗角、翻手为云、大开大阖的斗争局面,呈现了一幅商场如战场的画面,让人感叹当下中国转型期的波诡云谲。

几篇描写小人物的作品令人难忘,从中可以窥见历史转型的侧影。毛建军的处女作《北京人》非同凡响,通过一对下岗夫妻的拼搏,写出了北京普通民众在改革进程中所体现出的坚韧、善良、拼搏、乐观的品质,是一部多年来难得的描写北京人精神风貌的优秀小说。小说催人泪下,有强悍的艺术感染力。张子雨《二手生活》以一个收废品小人物的生活遭遇,呈现了穷苦人生活中欢乐和高尚的一面,提供了一种与众不同的文化想象,有深切的感情。苏兰朵的《女丑》是一曲生命的悲歌,颠覆了我们当下关于演艺明星的美好想象,仿佛要告诉我们,在真正的、更为现实的演艺界,生存环境相当残酷,世事艰难,影星们绝不像平常看到的那样光彩照人、大红大紫。独眼的《通俗爱情》提供了新鲜的爱情经验,从情感侧面反映了中国两性感情领域发生的变化。小说挑战了传统的夫妻关系,怀孕了一种要挟爱情、浑水摸鱼的筹码,而肚子里的胎儿却像一件东西,必要时可以扔掉。岳母看到女婿陪别的女人到医院做人工流产,非但没有在女儿面前添油加醋,反而充分理解。这些新的情感经验令人震惊。林那北的《燕式平衡》以女性作家特有的细腻讲述了一件小事导致的人生悲剧,向我们提供了一个官太太锦衣玉食的生活表象与其精神痛苦,高度戏剧性地呈现了当代婚姻的复杂纠葛。小说中许多官员生活的细节有着现实的影子,意味深长。

孙晶的小说别具一格,他专攻悬疑,但与网络流行的悬疑又有较大区别。《烛影斧声》根据史书中关于宋太祖之死的只言片语,敷衍出一部悬念重生、曲折迷离的历史故事。小说不仅重构了历史细节,有深厚的史学修养,还塑造了一个有气节的知识分子形象,他秉笔直书的史家气节和曲折回环的故事框架搭配得天衣无缝,既是历史,也是探案,有强烈的戏剧性。

总的来说,2011年的中篇小说是小人物的天下。英雄无觅,这也深刻地反映了当下作家的历史观。农村小说或农民工进城的作品丰富,而真正意义上的城市小说依然是弱项。

■新作快评 晓苏《保卫老师》 《花城》2011年第5期

时代的尴尬和疼痛
□李勇

“我”乡下的父亲千里迢迢赶到“我”就读的大学,为的是给“我”的硕士导师林伯吹教授送“礼”,“礼”不是烟酒人民币这些好礼豪礼,而只是老汉引以为贵的一种家乡特产——鹿胎,鹿胎在“我”老家是“馈赠的最好礼品”,父亲之所以给林伯吹送鹿胎,不是求他办事,而纯粹是为表达尊敬——这尊敬是对林教授的,但更是对“老师”这个行当的;也正因此,“我”才感到了压力,因为“我”并不尊敬林伯吹,因为林伯吹根本不值得我尊敬,这个唯利是图、斤斤计较的家伙,顶着“教授”的头衔,实则是一个庸俗势利的小人。

小说全篇就是写“我”如何苦心孤诣地阻止父亲送礼。这种阻止不是公然的,而是通过想各种办法和借口来实现的。“我”绞尽脑汁、小心翼翼,而目的只有一个:维护林伯吹作为“老师”在父亲心目中神圣的形象。在此可见,“我”的维护实际上指向了两点:一是“老师”,或者说是“老师”所表征的一种价值和理念;二是父亲,确切地说是父亲那颗尊敬的心,那颗单纯而朴实的、包含了美好向善的情感的心。

所以,如果我们把小说当作一篇批判写实的作品来看待的话,里面的人物最丰满的其实是“我”,而不是林伯吹,也不是父亲,因为这篇“批判现实”的作品的主题再明显不过了:它是在批判不良的道德和人心,以及由此衍生的一种腐败恶质的社会现实。作为这种社会和人心的代表的是林伯吹,代表这种社会和人心对立面的则是父亲,他们都内涵明确,质地鲜明;而“我”则相对复杂,当然这种复杂主要不是来自意蕴和内涵上的,而是来自功能上的,即“我”作为连接林伯吹和父亲以及他们所代表的两个世界、两种价值观和道德的桥梁,“我”身处林伯吹那个浑浊其间的世界而心向父亲那个纯朴世界,“我”的心地也许确如父亲般纯朴,但“我”的情感却是复杂的、五味杂陈的。

所以,如果将小说认定为一篇批判现实的写实性作品,从某种程度上说可能并不是对它的最好的理解方式——它是批判的、讽刺的,但它却不是写实的,这不仅见之于小说人物的内涵明确,也见之于小说情节的单纯:林伯吹、父亲和“我”构成了关系的三角,林伯吹和父亲的“冲突”因“我”而一再延宕,但最终还是不可避免地发生……这样的叙事有着极强的线条感和动感,轮廓鲜明、铿锵有致,但从坏的方面来讲,也便失之于简单。但这似乎不是晓苏个人的问题,而是所有讽刺艺术或多或少都有一种“缺陷”,因为主体态度(讽刺)总是过于明确,所以多多少少总会减损艺术作品的那种混沌性。

晓苏是一个道德感很强的作家,他的小说能鲜明体现出这一点。但在如今的中国文坛,道德似乎早已沦为了“过时的小调调”,尤其是世俗化进程加速和文化相对主义的盛行,更加剧了道德在中国人精神结构中的危机,然而道德作为一种“话语”的“过时”是否意味着我们不需要道德?答案不言而喻。“学生一定要尊敬老师”,小说中父亲对儿子说的这句话便暗含了一种朴素的道德愿景。

《大地汉书》让我想起丁庆中的上一部小说《老鱼河》。在我看来,丁庆中就是“老鱼河”里的一条老鱼。他在《大地汉书》第一章又感叹了一回:“对于一条鱼来说,所渴望的就是一条河。”拥有一条河,那是一条鱼最大的快乐。丁庆中的写作是在寻找灵魂的故园和归宿。

《老鱼河》在诗一般的悠悠感觉转换中推出了一个近乎“原始”的乡村意象和众多“本能”的农民形象,意味深长的隐喻性覆盖了反封建、反落后、反愚昧的批判意义。这回写《大地汉书》,丁庆中依然带着他那股子特有的犟劲、狠劲,继续处理着他真正关心的东西。土地,一直是丁庆中的精神根底,或者说,已经成为其信仰。他说:“一旦离开土地,就像远离人世。”他的土地情怀,浓得让人一时难以化解。这回他从“老鱼河”的上游写到了下游,写到了两岸、彼岸;结构方式也有所改变,从以往的多视角复写记忆,变作独自立足的前思后想,不停地变换思路。

乡村给丁庆中以无穷无尽的暗示,提供了巨大的想象力和理解力。缓慢的乡村,缓慢的流变。在《老鱼河》中,丁庆中写了一座具有象征意味的桥,从老桥——烧桥——建桥这样的线索中让人看见岁月若水,漫过时代的鸿沟;他写了肯定、维护与忍耐,也写了否定、变革与反抗……而小说给人的总体印象却是:这村庄变化不大,起码说不上变迁。这令我读出中国乡村被遮蔽的部分——半个世纪以来的城乡二元社会结构中的乡村、缺少制度建设的乡村、家长制的和宗族阴影下的乡村。就像小说中那座眉目不清的桥一样,断断续续的现代性在中国乡村还没有形成传统,而反传统又往往表现为一种原始的混沌冲动。

与拔高和大呼小叫不同,丁庆中的写作是一种沉稳向下的

根据较普遍的看法,“红歌”即指红色革命歌曲,是赞扬、歌颂革命和祖国的歌曲,它们普遍具有浓郁的感情基调,有较强的歌唱性、节奏感。它们真实、生动、感人地反映了共产党领导人民闹革命、搞建设的辉煌历程,是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资源,为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胜利提供了不竭的动力,具有爱国主义的教育和教化作用。

被称为“红歌诗人”的曲波在近20年来创作的红歌歌词,在艺术上已经达到恩格斯所推崇的“进步的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的完美统一”,受到上至中央政府机关下至民间普通百姓等各个社会阶层的广泛喜爱,在广大民众中被广泛传唱,具有长久的艺术生命力。可以说曲波从歌词创作的实际层面为解决“普及和提高”的问题提供了有益的解决方法。这亦是曲波在红歌领域被称为“栋梁级人物”的一个主要原因。

从内容主题来说,曲波扩大了红歌的表现范围,大到国计民生政策的“宏大主题”,小至人民日常的衣食住行等“微观”主题,任何题材均可入歌。因此,虽然迄今为止他已经创作出300多首红歌歌词,但是这些歌词在内容上却“和而不同”,均有自己独具特色的着眼点。具体来说,曲波或专注于新世纪中国不断提升的综合国力的歌颂,有《中国鼓》《中国志气》《中华满堂红》《中华贺岁曲》等红歌歌词,而在新世纪以后创作的红歌《领航中国》是其中最典型的代表作;或与国家政策呼应、阐释时代重大主题,作品主要包括《中国共产党员大合唱》《凝聚》《传家宝》《永恒的真理》《共享和谐》《科教兴国》与《和谐中国》等,表达出广大人民对党中央提倡的“和谐社会”政策的拥护;或强调和弘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精髓,主要有《中国娃》《茶香中国》《中华美德》《中国字画》与《中华美德》等红歌;或是谱写高校人文情怀和知名企业的文化追求,像《鲁东大学校歌》《临沂大学校歌》和《吉祥如意》

■评论

描摹大地本色

□刘向东

写作,是感官的写作,是一种感受方式和理解方式、一种生活理想和生活态度,就像他的为人,没有使劲向上升华的企图,就像他的处事,没有戏剧性的故事编排。他写作的耐心、他的信念和诚实,使生命和生活中慢的品质在火烧火燎的表象下沉淀下来。

与《老鱼河》关注村庄不同,《大地汉书》在田野上铺开。丁庆中以生命的眼光看待大地上的万物,穷半生心力,陶醉于泥土的气味儿、色彩和声音中,探索用语言解析猫啼草,用灵魂感知棒子粒儿,通过用心的细致感应,达成对生命的整体关怀。因而,他的小说始终保持着对生命与生存的个别的感觉和看法,保持着对土地、河流、玉米、麦子以及驴的相依为命的姿态。丁庆中固执地捍卫着他的写作方式,他知道正是这些值得他捍卫。这种捍卫本身就是价值,就是品格。

《大地汉书》虽然依托乡土,其精神内核却并非乡愁,而是“存在”、“此在”,是脚下这片沧桑的土地,是并不遥远的记忆和身边的日子,也是可能性。他的写作泄露了他内心的忐忑,他“就是怕变了,一看到变了,心就哆嗦”。

然而,不变是不可能的。变,让记忆的乡土和现实的乡土分

裂了。本来,写乡土,对于丁庆中,是精神的游走,也是灵魂的回家。他在乡土的根扎得越深,他的心思就越远。他不可能离开,也不可能真正回去。这回,他面对的危机是正在丧失精神的立足之地,走着,走着,身体和精神走散了。红镇上的刘家、董家、张家、李家、王家,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七零八落。家,表面上还在,内里越来越成为一个方位,成为只有一死才能抵达之地。

但这并不能动摇丁庆中对土地的信赖。《大地汉书》传达给我的是,或许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与别的时代并没有什么两样。丁庆中笔下的大朝、红翠之辈,看上去是一些固执的不合时宜的人物,固守着看似背时的、正在流逝的东西,但他们并不背运,他们的棒子粥养人,汉字也养人,命根子硬,命脉源远流长;丁庆中笔下的“我娘”,是一个不需要自己名字的人物,她倾向于沉默,菩萨心肠,但出口即盛,不一定一句顶一万句,但句句说出真相。张惠玲、李六根等等那乱哄哄一大帮子,将一毁于他们的欲望,终为粪土。尽管如此,在丁庆中笔下,依然充满万般柔情和无尽悲伤。

值得信任的依然是土地,充满希望的是这片土地上成长着的万物和子民——这是《大地汉书》的揭示。“在这个早晨,龙埋头在打磨一把锈迹斑驳的锄,他打磨得很认真……而我的眼睛里只有一种色彩:绿色。什么都可能成为绿色,所有的一切由来全都依赖绿色。那么我也就会在这绿色上去想象,去考量所有的一切。我想,要是没有这种颜色,那我将否定一切。”《大地汉书》的尾声,可谓意味深长。先贤穿越四季,看见“白茫茫一片大地真干净”,庆中看见“到了春天,就连一根扁担也想发芽。”这春天、这温暖,这绿便是大地的本色。

曲波:跳出主旋律来写主旋律

□张清芳

等作品;或是描述家乡故土山东烟台的人情风物,包括红歌《胶东人》《新山东》《中华泰山》《爱在烟台》等,这是数量较多的一类作品。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曲波以红歌歌词为媒介,较好地把中国的革命历史和现实改革、国家的集体意识和个人的民族荣誉感,以及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性和现代化的世界背景融为一体,把红歌——作为国家民族主旋律文化建构的一个有利举措,落实到最普通的人民群众中去。

从语言形式的角度来说,曲波把红歌歌词当做诗歌来写,从歌词“意象”入手来提高其艺术性和文学性。虽然红歌歌词强调简单明了,易于记忆和吟唱,但是作为专供歌唱的一种文学样式,同样也需要具有艺术的创新性和文学性,要用文学的审美魅力不断征服民众,才能够让后者在主动自觉地接受和传唱红歌的过程中,不断扩大红歌的影响力和影响范围,从而实现“在普及中提高”,不但是对广大人民的爱国情操和正确道德意识的“普及和提高”,同时也是红歌在深入人心方面的“普及和提高”。正是因为认识到红歌歌词艺术性和文学性的重要作用,曲波用诗歌的艺术标准来要求自己,对每一首歌词的意象都进行精心选择和细致雕琢,力求既准确概括又新颖独特。具体到作品来说,曲波歌词的意象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具有广阔概括力,涵盖中国富强内容的意象,以《领航中国》为例来说,曲波别出新裁地把“巨轮”作为中心意象,以此象征蒸蒸日上的现代中国;由广袤的“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组成的

“甲板”意